

特权与优惠的 经济学分析

张 军◎著

◎立信会计出版社



JINGJIXINLUNWENCONG

●经济新论文丛

总 序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已经16个年头了。翻开世界近现代史,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在这样一段历史时期内像中国那样取得经济高速的发展,11亿多人民的生活显著提高,经济体制改革重大突破的“三合一”成就呢?可以说,绝无仅有。这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确性的生动证明,他的经济思想核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胜利。

回顾社会主义走过的历程:从否定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到部分承认部分否定;从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肯定有计划商品经济;从否定市场经济到肯定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一百多年漫长的认识历程啊!生产力的急速发展和受阻,人民生活的提高和下降,国家综合实力的强盛或衰落,社会主义的兴衰荣辱,无不与这个关键问题相联系。社会主义历史地选择了市场经济,这是唯一正确却又是艰难的选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不熟悉的一条新路。虽然已经确定它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设计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但我们没有认识或者还没有完全认识的东西还很多,随着实践的进展又会出现层出不穷的新现象、新问题:公有产权如何才能适应市场经济,现代企业制度究竟有哪些涵义,怎样逐步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怎样才能形成和规范化,清除种种非理性行为和权钱交易歪道;在复关的机遇和挑战面前,如何进一步开放,外贸外汇体制的改革,人民币汇率和自由兑换都是有待

(沪)新登字 304 号

责任编辑 曹均伟

封面设计 闵 敏

经济新论文丛

特权与优惠的经济学分析

张 军 著

立信会计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西路 2230 号)

邮政编码 200233

新华书店经销

立信会计常熟市印刷联营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 插页 2 字数 92,000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429—0279—2/F·0267

定价: 7.00 元

解决的难题；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难免付出环境代价，关键又是怎样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回报；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某种非均衡大概是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在实现宏观经济目标中，政府的调控，政府的行为，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尤其显得重要，这又牵涉到一系列问题。总之，各种各样挑战性问题，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

出路在于学习。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对我们不熟悉、不了解、不懂得的东西，只有通过学习，学用结合，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才能不断取得改革和发展的胜利。否则，就可能用老一套认识对待新事物。或者是，口头上说的是市场经济，行动上却搞计划经济，或者呢？把搞市场经济说成是搞资本主义。只有掌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有关的方针政策，才有可能用新理论、新观念去认识和处理问题。

学习离不开研究，研究也是一种学习。研究贵在创新。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1亿多人口的大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创造性事业中，创新尤其重要。市场经济历史上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形成和发展的，它创造了市场经济下如何经营管理企业、市场和全国经济的经验，这属于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我们应该认认真真学习的；我们要对外开放，与国际经济接轨，不学习国际市场经济的规范更是寸步难移的。但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市场经济，我们总要力求避免和缩小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现的市场经济中的负效应，因此需要有创造性；不能照搬照抄外国。再有一层，我们是在一个发展中大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情况，大国与小国也不可同日而语，这又是需要发挥创造的原因所在。最后，我们是从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客观上就是一件崭新的事业，没有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新的设计，能成功吗？就说都是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的市场经济模式，也莫不反映各自的经济水平，政治体制，历史文化传统等而各具特色。

当然，创新有不同的层次，多种多样的形式。开创新的研究领域和学科，提出新的观点和内容，有了新的论证和表达，是创新；运用现代经济学已有的理论和方法，从中国实际出发，说明中国的现实，找出解决的思路和途径，换句话说，真正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也就是有新意，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包含着理论上的创新。我们正是从这些涵义上理解创新的，因此把这套丛书定名为“经济新论文丛”。

“经济新论文丛”的作者，大多数是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经济研究的博士，也有上海财经大学博士后站的和其他兄弟院校的博士或副教授。博士后流动站，顾名思义是已经取得本国或外国博士学位的优秀青年经济学者，他们是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国家队，他们基础厚实，学有专长，思想敏捷，勇于创新，努力为繁荣我国的经济作贡献，为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责。

现在，他们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贡献出来，立信会计出版社又慷慨地提供出版条件，我欣然同意他们邀请我担任这套文丛的主编，并为之作了序。

伍柏麟

1994.9

前 言

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本《特权与优惠的经济学分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笔者近年来在产业组织理论、寻租理论、产权理论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读书笔记和一部分研究的成果。七章内容虽各成体系，但基本上从各自的角度和方面涉及了同一个论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是怎样应用于对这些问题的分析的。作为本书的作者，我希望这本书所做的对垄断特权的“产业组织分析”，对寻租理论和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的理论述评，对计划特权的分配、人际关系、对腐败问题和对优惠政策的理论探讨能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特权及其相关的问题提供一些启发和帮助。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笔者也就感到无比欣慰了。

在这七章当中，头两章的写作在时间上可追踪到1988年前后，那个时候我对产业组织理论发生着浓厚的兴趣，做过大量的读书札记，甚至成为我的硕士论文的研究内容。现在读者看到的这两章已经做了许多修改和补充，特别是经济学家戈登·图洛克(G. Tullock)的最新研究已被吸收与补充进来了。在这里特别要感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李会明博士，他向我推荐了图洛克的一本新著，并且十分巧合的是，这本新著的名子叫《特权与寻租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Special Privilege and Rent Seeking)。其余几章大都代表了作者1990年以后的部分研究成果。关于对寻租经济学文献的述评是我涉及寻租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时的读书笔记；对计划特权的分析是运用产权理论的一个尝试，本章是在已发表的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对优惠待遇的经济

分析是基于我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期间(1992—1993)所写的论文而改编的,原文系英文,其提要已发表在留英经济学会编辑的《通讯》(CEA Newsletter)上;第5、第6两篇论文成文最晚,但思考这样的问题却是几年前的事,其间曾写过一些,但断断续续拖至今天方得以完成。

现在这本书能得以问世,要归功于立信会计出版社的詹文锦社长、曹均伟副研究员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的张雄博士的共同努力,对于他们的支持和为之付出的劳动,作者表示诚挚的谢意。作者还要感谢这套书的主编伍柏麟教授的关心、支持和对作者的鼓励。另外也要感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黄亚钧博士、姜波克博士、袁志刚博士、张晖明博士、张雄博士、石磊博士、李会明博士,上海财经大学的朱东平博士和空军政治学院(上海)的张克难副教授,与他们在一起经常讨论问题使我得到了鼓励、促进和努力的信心。最后还要感谢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经济系的威廉·哈勒根博士,我们在过去几年里的交流和我们共同感兴趣的问题的学术探讨对我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同时要致谢的还有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SCC),是它的慷慨资助,使我得以来到美国与哈勒根博士共同探讨我们所感兴趣的问题,也使我能在这里为这本书的问世做最后的努力。

我的家庭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了无限的关怀、理解和无私的奉献,我把本书献给他们,以表达我对妻子和孩子的爱。

张 军

1994年11月26日于美国华盛顿州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寻求垄断特权：关于成本的衡量	1
一、垄断特权的社会成本：从古典到现代	1
二、寻求垄断特权的成本	7
三、简短的结论	11
第二章 管制与垄断特权：关于自然垄断理论的发展	15
一、管制“自然垄断”：传统的观点	15
二、可竞争市场理论的发展	19
三、管制的含义	25
第三章 寻租经济学：一个述评	31
一、寻租的定义问题	31
二、寻租的政治经济学：一些理论贡献	38
第四章 计划维系的特权：一种产权分析方法	57
一、概念问题	57
二、关于产权和外部性的一般理论	59
三、计划特权与“科斯定理”	65
四、中国的经验：“买入型”变迁	70
第五章 关系与特权：一个初步的经济分析	75
一、关系的性质	75
二、对关系的投资分配：一个简单的分析模型	80
三、一个相关的应用	82
四、经济分析	86

第六章 腐败：理论的分析	92
一、腐败的定义.....	93
二、腐败的效率问题.....	97
三、一些展望	105
第七章 “优惠”的社会成本：从企业角度的分析	108
一、引言：“优惠”的经济学分析.....	108
二、“优惠”的保护效应：“×——非效率”分析.....	109
三、寻求“优惠”	112
四、简短的结束语	116

第一章 寻求垄断特权：关于成本的衡量

一、垄断特权的社会成本：从古典到现代

在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享有的“垄断”地位是一种典型的“特权”。所谓“特权”，就是由政府的强制权力所维持的排他的权利。即使对少数“自然垄断”的行业或企业而言，也时常因政府管制而得以维持垄断利润，对那些垄断权全然由政府授予的工业企业来说就更是如此了。维持这种政府特许的权利及以追求垄断特权本身已被经济学家认为是一种追求“直接非生产性利润”(DUP)的活动即资源消耗的活动。^[1]

然而，在古典经济学说史上，垄断却是被古典经济学家看作不以为然的论题。许多被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成垄断行为的东西，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却时常被加以肯定。埃德温·韦斯特(Edwin G. West)对此有过这样一个回顾和评论：

“人们普遍认为，在历史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对垄断的攻击最为持久不懈和最具破坏力。斯密确实经常提到‘垄断’，他是典型地按照18世纪的广义使用这个词，其中包含各种政治限制。现代意义的垄断，作为单一的不受竞争的厂商，则并非斯密惯常所指的。他最经常使用垄断这个名词，指享有法律保护的多厂商行业。比如，法律给制鞋商和制鞋商垄断的地位，不仅对我们的牧场主，而且对我们的鞣皮商都实行垄断（斯密

(1776年), 1960年, 第2卷, 第153页)。同样, 他对整个重商主义体系判定为垄断的: ‘确实, 这种或那种的垄断, 看来就是重商主义的唯一手段’(同上, 第129页)。

李嘉图学派也更为关心一般的限制, 特别是土地的有限供应。事实上, 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在292页的篇幅中只有5页讨论了垄断, 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长达1004页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只有2页涉及到垄断。在李嘉图学派之后, 19世纪中叶达尔文哲学的发展只是支持了古典主义者对竞争必要性——即使并非其不可避免性——的重视。诚然, “现代的”和更为严格的垄断理论——指出均衡决定于边际收入和边际成本相等——是由古诺(Cournot)早在1838年引进的, 但很久以后, 这一理论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美国, 有关竞争和不完全分散经营的古典主义自由放任观点, 至少到19世纪末仍很风行。当谢尔曼(Sherman)反托拉斯法于1890年通过时, 经济学家们几乎一致反对。例如, 美国经济学会的创始人理查德·T·伊利(Richard T. Ely, 1900年)尽管对广泛的政府干预一般持否定态度, 但坚决反对“解散托拉斯”这种政治上有号召力的政策。19世纪80年代后期, 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也曾担心反托拉斯法会使联营或托拉斯所能产生的效率优势损失掉。联营本身常常是形成足额资本和在经济周期萧条阶段应付灾难所必需的。当代其他一些经济学家, 包括西蒙·N·帕滕(Simon N. Patten)、戴维·A·韦尔斯(David A. Wells)和乔治·冈顿(George Gunton)也持类似的观点。冈顿认为, 资本的集中并非把小生产者赶走, ‘而只是将他们并入一个更大、更复杂的生产体系, 使之能够更廉价

地为共同体生产财富，同时也使他们自己获得更多的收入。有人说资本的集中会破坏竞争，这不是真的。相反地，通过运用大额的资本，精良的机器设备，较好的设施，托拉斯的商品售价比单个公司要低’。”〔2〕

到了新古典经济学那里，情况被颠倒了过来。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垄断被与“完全竞争”对立了起来，用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的话说，垄断就是“缺乏竞争”(1923)。这个观点和对垄断的理论处理方法是从19世纪末逐渐兴起和发展起来的，现在在每一本关于微观经济学的教科书里，垄断的这个理论及其与完全竞争做对比的这个处理方法都有所展示和反映。那么，垄断或企业的垄断特权到底对社会有什么危害，理论上怎样加以说明和处理呢？这个问题在本世纪50年代以及稍后时期成了经济学家研究的一大热点。最有影响的一个基础研究是由经济学家A·哈伯格(A.C.Harberger)于1954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垄断和资源配置”一文中提出的，他在该文中测量了垄断特权的社会成本(即社会福利净损失)。〔3〕他的基本论点及分析方法可以转论如下：

首先，为了考虑垄断的负面影响，我们需要考虑使用马歇尔提出的消费者剩余概念以及与之相联的另一概念“生产者剩余”。我们知道，消费者剩余的大小从静态上可以用市场均衡价格的数量点左侧由需求曲线围成的面积来衡量。同样，我们可以用市场供给曲线类似地来衡量生产者剩余。下面让我们以图1-1来说明这两个概念。

其次，假定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对于企业和整个产业都不变，用 $MC=AC$ 来表示，在完全竞争的假定下，市场均衡产量由需求曲线 DD 和成本线 $MC(=AC)$ 的交点 B 来决定，这时均衡产量为 Q_c ，市场均衡价格为 P_c 。此时的消费者剩余这样计算，由需求曲线 DD 以下围成的面积，在 Q_cB 构成的区域内形成的梯形面积 OQ_cBD 表示，消费者从购买和消费该产品的行为中可获的总的福利(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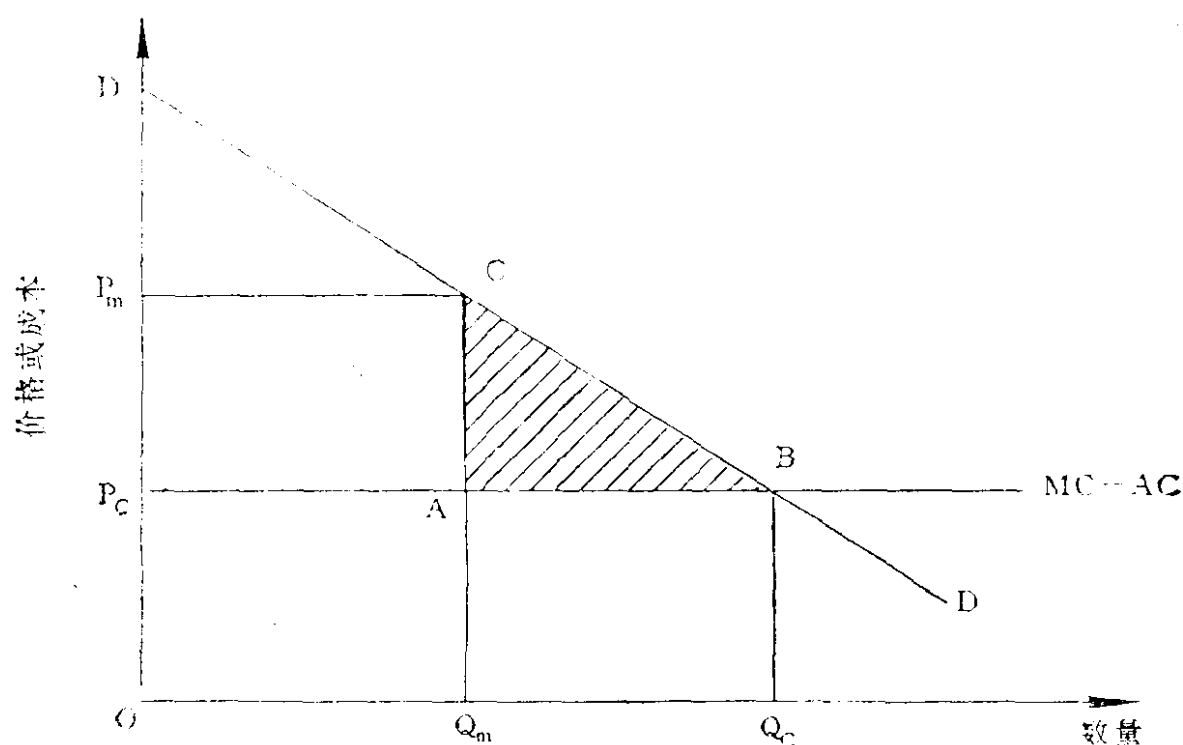


图 1-1 垄断的社会成本：哈伯格三角形

用)。为了这一福利，消费者支付的总费用由购买价格 P_c 和购买数量 Q_c 的积表示，亦即由 OQ_cBP_c 围成的矩形面积。根据马歇尔的定 义，消费者剩余在上述几何图形上就表示为面积 OQ_cBD 与面积 OQ_cBP_c 的差，也就是三角形面积 P_cBD 。

然而，如果上述企业现在由于某种原因(如从政府那里得到垄断特权)成了市场上该产品的垄断者，这时为了追求垄断利润，这个垄断者则限制生产到比如 Q_m 以维持较高的垄断价格 P_m 。与完全竞争相比，垄断者获得的垄断利润看上去似乎是矩形面积 P_cACP_m ，但其实并不能这样来看待问题。现在我们要看到的是，当产量削减到 m ，价格提高到 P_m 时，是生产者的剩余从零增加到了 P_cACP_m ，与此同时，消费者剩余则从原来的 P_cBD 下降到为 P_mCD ，也就是说，由于垄断特权的存在，消费者剩余减少 P_cBCP_m ($=\triangle P_cBD - \triangle P_mCD$)。其中有一块 P_cACP_m 转到了垄断者手中，成了生产者剩余，这一块面积对于社会来说并非代表福利的损失，只是代表福利的转移。因此，由垄断特权造成的社会福利

净损失实际上应为三角形面积ABC (图1-1中的阴影三角形)。这个三角形被称作垄断的“无谓损失” (deadweighted losses), 也叫“哈伯格三角形”。

哈伯格教授利用上述理论试图来测算美国制造业因垄断造成的福利损失。为此, 他假定了许多东西, 特别是假定所有产业的边际成本MC都保持不变, 需求的价格弹性处处为1即单元弹性。在此基础上, 他测得, 美国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20年代因垄断带来的福利净损失约为5900万美元, 也就是只占当年美国国民收入的千分之一。

随后的很多经济学家们认为, 由于统计和其他方面的原因, 哈伯格的测算严重低估了垄断的社会成本。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教授指出: 第一, 垄断者通常在价格弹性大于1的范围内生产; 第二, 垄断的某些利益已包含在资产的帐面成本中, 因而导致了报告利润的低估。^[4]沿用了斯蒂格勒的建议, 后来的不少研究成果所报告的垄断社会成本要比哈伯格所说的高得多。例如, D·R·卡默申(D.R.Kamerschen, 1966年)提出, 1956—1961年间, 由于垄断而造成的年福利损失大约为国民收入的6%。另一方面, D·A·小武斯特(D.A.Worcester, Jr, 1973年)采用厂商的而不是行业的数据, 同时假定价格弹性为-2, 提出1965—1969年的福利损失最大估计值为国民收入的0.5%。考林(Cowling)和缪勒(Mueller)于1978年针对这样的抱怨——哈伯格假定正常的竞争利润率可用实际赚得的平均率来表示, 而后者本身已包含垄断利润的因素——计算出1963—1966年间美国734个大厂商造成的年福利损失共计150亿美元, 相当于公司生产总值的13%。^[5]

哈伯格的方法论是新古典主义的, 而新古典方法有一个隐含的前提, 即交易成本假定为零。在这个假定下, 垄断者可以实行完全的价格歧视政策。例如, 实施两部分收费而对超过 Q_m 的所

有购买都按第二种价格收费，就会发生上述情况。如果这种价格正在 P_m 和 P_c 之间的中点，那就福利损失的三角形会缩小到现有面积的 $1/4$ 。当然，重复运用价格歧视的同样原理，我们会想象到福利损失的三角形会缩小。这就是说，从逻辑上说，在新古典主义的世界中交易成本既然为零，百分之百的差别定价是可能的。这样一来，则整个梯形 P_cBCP_m 将包括从消费者转移到生产商的财富，由垄断造成的福利净损失将为零。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上述哈伯格的方论基础受到了批评和怀疑。于是，有些学者开始绕开新古典的模型，试图从古典主义的分析中寻找对垄断的经济分析。这种古典式的分析把竞争看成一个过程来处理，在这里运用熊彼特的思想是恰当的。韦斯特强调了 this 古典主义的方法。为了说明情况，仍借助于图1-1。但现在采用的不是一种静态的长期均衡的完全竞争概念，而是亚当·斯密及其继承者所信奉的在某个时间条件下进行竞争的过程这样一种关于竞争的观点。用熊彼特(Schumpeter)的话来说，竞争好似“持续的阵风，造成创造性破坏”。当然，盈利的可能驱使着创新的企业家。如果没有竞争，分散经营的自由放任模型就会崩溃。不过，一俟成功的先驱者获得利润，其他人即会仿效，因此，企业家利润就会不断地因竞争而被他人夺去。这种观点着眼于无数短期的连续不断的序列，而“完全竞争”的分析则始终是以相当长的时期来表达的。两者的区别正在于此。假定某个企业家发明一种新产品X，当价格为P时，他提供的产品数量为 Q_m （参见图1-1）。如果说，与他潜在的竞争对手假定掌握他的知识，他也会限制产品的数量；那只是在基本上说得通。当然，实际上对手们并没有这样的条件，因而如果不是供应 Q_m 的X产品就只能是用原来的生产要素去生产一定数量的原来的产品（而X的供应则为零）。因此，他生产X产品的结果是纯粹的社会收益，可以图1中的利润加消费者盈余S来测算。社会损失的福利三角形(W)也就不

存在了。可以预料，这位企业家的行为将最终导致竞争对手的进入，到这一阶段，竞争将导致价格和成本下降。接下来，这一过程又会引起财富从原来该企业家那里向消费者转移。不过，企业家原来的暂时的利润是促使他较之没有这种利润更早地引进新产品。正是这种较早的引进产生了社会收益。因此，虽然这种暂时的利润可能被描述为来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但根据斯密—熊彼特的分析，为此描绘的垄断也是必要的制度，因为缺少它，经济增长将会慢得多。当社会以专利权的形式赋予暂时的合法垄断时，社会也就承认了这种逻辑。〔6〕

除了上述观点之外，对于垄断特权的社会成本后来成为那些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学者再次考察的主要问题之一，特别是由戈登·图洛克(G·Tullock)的开拓性工作所推动，这些考察被冠之以“寻租”理论而成为引人注目的文献。

二、寻求垄断特权的成本

应该说大多数的垄断并非自然垄断。也就是说，它们不是来自所谓无法抗拒的技术或经济需要，而是来自人为的安排，常常通过政治权力的行使而产生。在这些情况下，垄断常是由政府授予的，并非出自鼓励引进新产品(正如专利权一样)的目的。相反，一个企业被授予独家经营一种现有产品或服务的特权，而其他所有供应者则被排除在市场之外。这样，竞争的自然状态经过行政或法令而转化为一种合法的垄断。实际上在哈伯格的福利损失模型中我们讨论的垄断与此有更大的关系。

如果考虑到对垄断特权的追逐也是一种竞争活动，本身也需消耗资源，那么，哈伯格对垄断特权的社会成本的理论衡量就需做进一步地修改。在这方面，经济学家戈登·图洛克的开创性工作(1967)以及后来为之所做的一系列研究具有重要价值。〔7〕

在图洛克看来，经济学家对垄断特权的社会成本的传统观点是一个错误。为了理解过去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对垄断特权的错误观点，这里借助于图洛克用于说明其论点的一个图(注意，实际上这个图与我们前面在讨论“哈伯格三角形”时使用的图是基本一致的，只是稍作修改)，即图1-2。在图1-2里，横轴表示某个产品如小麦的数量，纵轴表示价格和成本。CC线代表生产小麦的边际成本，也就是代表具有不同肥力的土地的生产成本。我们知道，一个竞争性的市场将保障市场出清价格P的存在，这时候，小麦的数量为Q，它是供给曲线CC与需求曲线DD的交点。在均衡时，Q点右边的土地因肥力较差、成本较高而不再耕种。由CC以上部分与P以下部分围成的面积我们称之为“李嘉图式地租”，它归属土地的所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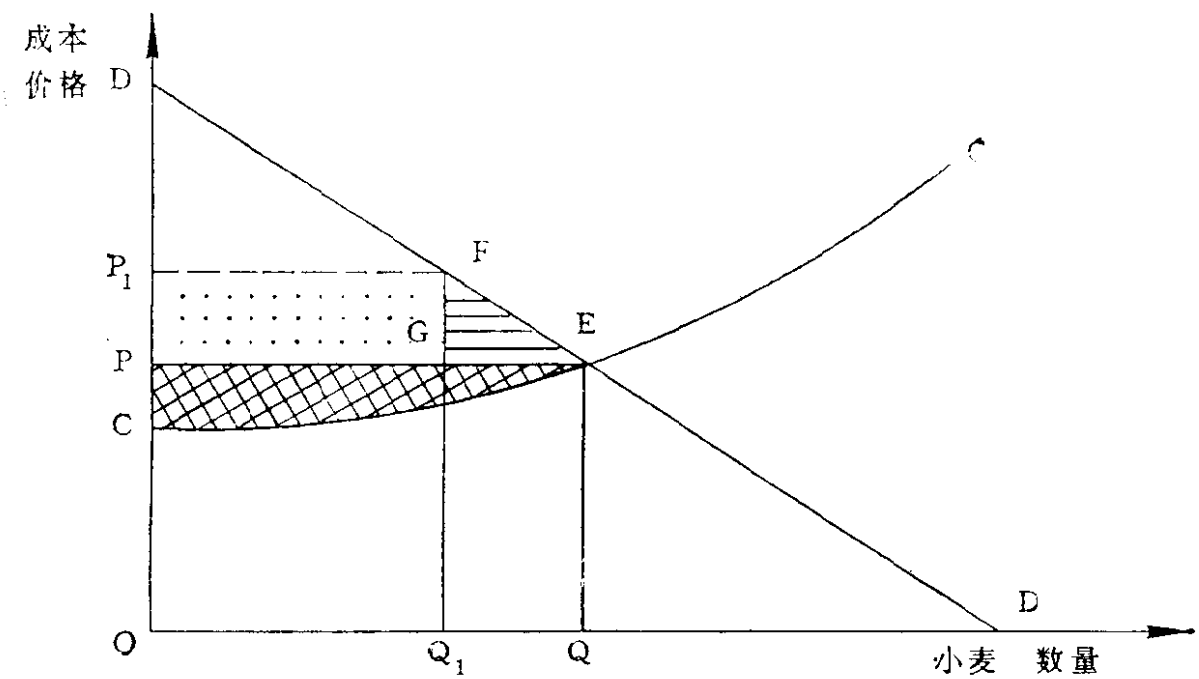


图 1-2 再计算的垄断特权的社会成本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生产者(即小麦生产者)若要获得较高的利润，那么，采取的一种办法是“限产保价”，通过减少小麦供给量来维持一个较高的小麦价格；另一种办法是降低生产成